



【報道】

「我與金庸」的集體回憶

●李顯華 林晴



▲民政事務副局長許曉暉指出上世紀武俠小說中，金庸的作品具極大影響力。



▲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熱情支持這次活動，並提及籌辦徵文獎的由來。



▲世界華文媒體執行主席張曉卿認為對文化和文學奇蹟的尊重與記載，是徵文獎最大的意義。



▲這次活動的推手、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潘耀明簡介徵文獎的籌備及評審過程。



▲浸大中文系榮譽教授黃子平為公開組作品作總評。



▲公開組一等獎得主李堯是視障者，多年來靠著聲音代替文字，進入金庸的武俠世界。



▲藝發局藝術教育組主席梁崇任總評學生組作品。



▲學生組一等獎得主孔雪珩表示得獎令她與金庸產生了一些交集。

為紀念金庸創作六十周年，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主辦的「我與金庸——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」，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舉行頒獎禮。大會邀請了民政事務副局長許曉暉、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朱挺、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執行主席、《明報月刊》社長丹斯里拿督張曉卿擔任主禮嘉賓，並請來一眾作家、編輯、教授及文藝界人士擔任頒獎嘉賓，一同感受金庸筆下的俠氣。

與金庸結緣的徵文比賽

今年的香港書展以武俠文學為主題，在展覽區內介紹多位不同年代，在香港成名的武俠文學作家，「我與金庸——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」頒獎禮剛好於書展期間同時在會展舉行，演講廳內外可謂「俠影處處」。首先由許曉暉、王英偉和張曉卿為頒獎禮致辭。許曉暉指出：「二十世紀武俠小說當中，金庸的小說作品具有極大的影響力，讀者不限於華人，不少外國讀者通過外文譯本，認識到金庸先生所創作的武俠世界。」是次比賽以金庸作品為題材，參賽者寫下與金庸結緣的經過。對於投稿情況，許曉暉說：「徵文比賽在去年十二月截稿，反應熱烈，投稿地區廣泛，足見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遍佈全球。本地學生的投稿情況也同樣令人鼓舞，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是跨年代、跨地域的，對不同年齡的讀者皆具吸引力。」

王英偉提及籌辦徵文比賽的由來：「猶記得去年，潘耀明先生與我和康文署副署長吳志華商量，提議在金庸創作六十周年舉辦全球華文徵文比賽，紀念金庸先生創作年份，也為明年初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設立的金庸展覽廳作宣傳，我與吳先生不假思索表示支持。」王英偉指出支持原因有二：於私，他自己是金庸迷：「若談及香港集體回憶，金庸小說定是很重要的一項，我們都記得小時候在被窩中，津津有味地看金庸小說的情景，小說陪伴着我們一同成長。」於公，金庸在世界文學界是很有成就的人物，值得大家推崇，他說：「金庸先生是蜚聲國際的文壇泰斗，他於二〇〇九年獲得了藝術發展局所頒發的『終身成就獎』，肯定他在文學、藝術及各方面研究的成就，金庸先生對文學與藝術的影響是深而廣的，除了文學創作，還有藝術評論、電影、電視、漫畫、遊戲



▲頒獎禮得到海內外眾多金庸迷出席支持。

等，未來也將一直延續下去。」張曉卿言及：「香港是創造許多文化奇蹟的城市，一九五五年，金庸的第一篇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問世，六十年後香港文化博物館為他設立金庸展覽廳，這是創造了奇蹟。對文化和文學奇蹟的尊重與記載，也是這次徵文獎最大的理由和意義。」他引用了金庸在《天龍八部》後記中的話：「任何寫作的人，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評。如果讀者看了不感到欣賞，作者的工作變成毫無意義。有人讀我的小說而歡喜，在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事。」他認為金庸雖然沒有來到現場，但他應該會感到欣慰，因為看到參賽者對其作品的熱愛，透過文字在彼此心靈深處進行溝通。

接着，由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、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，亦是此次比賽總召集人潘耀明，簡介籌備及評審過程。他指出：「秘書處共收到近萬份稿件，投稿地區廣泛，包括香港、澳門、中國內地、台灣、美國、英國、澳洲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意大利、荷蘭、法國、日本、印尼、馬來西亞等地。」並得到海內外的學者、作家、報紙、雜誌、社團等支持，獲得巨大迴響。而評審方面，潘耀明指出：「得獎作品由終審評委根據內容百分之五十、表達能力百分之三十、創意百分之二十來選出。評委由海內外知名作家、學者及資深編輯組成。」並指在評審過程中，秉持公平、公正的原則和一絲不苟的態度。由參賽者的不同背景可知，金庸小說聞名遐邇、影響深遠。潘耀明總結：「正是世上有井水的地方，都有華人；有華人的地方，都有金庸的讀者。在眼下倥傯的年代，金庸給全球華人一個美麗的梦想世界、一個動人的童話。」

遊走江湖 領略人生

致辭後是頒獎環節，分別是學生組和公開組，其中包括一等獎、二等獎、三等獎、優異獎及入圍獎。首先頒發的是學生組獎項，共二十個獎項。一等獎得主是聖保羅羅女中學的孔雪珩，她發表得獎感受時笑言：「我參加這個比賽是被媽媽連哄帶騙的，告訴我得獎後可見到金庸先生。」雖然金庸沒有來到現場，但這次得獎令她與金庸產生了一些交集，她笑說：「起碼現在於網絡上搜尋我的名字時，會出現



▲一眾嘉賓與得獎者合照。

『金庸』二字，非常榮幸能與金庸有這麼一點關係。」她回想：「我的人生觀、愛情觀都受金庸小說影響。」更笑言「若離於愛者，無憂亦無怖」是金庸在青蔥年歲時的她心中，留下的一句愛情箴言。孔雪珩說：「雖然我的人生至今只有十多年，但從小學翻看《神鵰俠侶》開始，我的大半生都在金庸小說中度過。」從她身上，可以看到年輕讀者對金庸小說的熱忱與支持，金庸熱潮自五十年代起從無間斷。

大會指出在籌辦過程中，原只設立公開組，本以為題材也許比較適合公開組，以令參加者水平更集中，但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梁崇任極力支持增設學生組，令年輕的金庸讀者得以發揮。梁崇任總評學生組作品時說：「學生的創意與藝術評論能力不能低估，寫作風格多樣化，亦表現出對金庸全部作品皆有深入和全面的認識。」參賽者討論了金庸作品的不同主題，有英雄氣節、愛恨纏綿、俠義精神、歷史傳奇等，按不同的專題深入探討。梁崇任指出：「投稿者從年紀最輕的中一生至應屆中六畢業生皆有，其中不乏佳作。金庸的名作對數十年後的新一代依然有強而深遠的感染力，印證金庸小說的魅力非凡，持久不衰。」他認為學生獲得的不只是閱讀小說的樂趣，更可透過小說豐富的角色人物看盡世間人生百態，領悟人性存在的真善美，認識中國歷史及古典哲學。「教科書中難以解釋的儒、釋、道的抽象概念，都可在輕鬆愉快、天馬行空的金庸小說中有所領悟。」

尋覓屬於自己的武林

接着是頒發公開組獎項，共十九個獎項。一等獎得主是來自台灣高雄的李堯，他是一個幾乎全盲的視障者，多年來靠著聲音代替文字，進入金庸的武俠世界。李堯發表得獎感受說：「金庸作品令人振奮，其繼承了五千年中華文化的精髓。」他直言自己能聽到這樣的故事覺得很幸福，他透過父親接觸到第一部金庸作品

《倚天屠龍記》，促使他日後成為了「金庸迷」。李堯的參賽作品《撼動心靈的完美藝術——金庸筆下的生離死別》，記述了因金庸作品，促使他與父親產生了微妙的關係，他於頒獎禮中指出：「父親的行為提點了我，能夠讓別人得到幸福，是我們應該終身追尋的目標，金庸老師的武俠小說中一直帶著這種精神，我們需要繼承這份精神，把作品轉化成正向力量，幫助更多人得到幸福。」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黃子平看過李堯的作品後表示，金庸小說是代代相傳的閱讀：「父親帶年幼的你去醫治眼疾時隨身帶了一部《倚天屠龍記》，激勵了你後來以聽代讀讀完了全套金庸有聲書。」他認為金庸的小說是具延續性的，不限於年代與地域。

黃子平總評公開組作品時言及：「金庸的全球華人閱讀，『集合』起一個被稱為『金迷』的『想像的共同體』。階級的分野被超越了，從大科學家、院士到小學教師、底層打工仔，在書本面前無不是平起平坐的『金迷』。」他指出金庸的作品是跨越階層、性別及國族語言。黃子平認為閱讀是個體的個性化行為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：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郭靖，一千個黃蓉。」但對金庸迷來說，這「共同性」又是超乎想像的：「你只需到『金迷』專設的網站或論壇去瀏覽，他們對『金庸世界』中每一個細節都如數家珍，熟悉程度令人吃驚。」黃子平認為「金庸閱讀」構成了他們生命中的「真理事件」。

讀者進入金庸世界，沉醉於書中武林，在歷練中如獲知音，在恩怨情仇中感悟人生。對李堯來說，金庸小說是父子情；對孔雪珩來說，金庸小說是文化與情感的導師。而當你鑽入被窩中，金庸小說在手電筒泛黃的燈光下，呈現出來的又是一個怎樣的武俠世界呢？

(本文圖片為明報資料室圖片。撰稿人為本版特約記者。)

【文人軼事】

沙葉新是真的嗎？——沈西城

一九八七年友人古劍對我說：「我有一個同學大大有名，到了香港，介紹與你相識。」這個華東師範大學的同學便是沙葉新，當年已是名作家和編劇家，他原著改編的電影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我看了兩次，每趟都歎歎不可言，心想由譚詠麟飾演的李小璋若真的是高幹子弟，他的命運會不會是身繫囹圄、自殺身亡？在「珠城」樓頭初遇沙葉新，我問起這個問題，沙大哥想了想，回答：「在那年代，他會享盡榮華富貴。」對！七十年代，誰來打貪？那夜舉杯，談劇本，爽朗、激情的沙大哥，是內地文化界的清流，有豪言云：「挨批，得獎；再批，再得獎！」



▲作家和編劇家沙葉新。

不怕批，只懼病，沙葉新後來病了一場。三年前，《明報月刊》酒會重晤，起碼瘦了一個圈，趨前問候，他睜着眼睛問：「閣下是誰？」抬了古劍的名頭，這才勾起他模糊印象，說是記起，看他茫然的表情，大抵也記得不多吧！好漢怕病磨，磨不了戰士的鬥志，卻磨掉寶貴記憶。回家翻舊物，搜到跟沙葉新的合照，胖嘟嘟，很和氣，跟眼前所見：瘦削、頹廢，全然是兩個形象，我忽地想：「剛才見到的那個沙葉新，可是真的？」

(作者是香港作家。)

【公開徵稿】

打開「城中詩」專頁 等待你用詩句來填滿

新詩創作、詩評、譯詩皆可，歡迎讀者投稿。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刊出，新近截稿日期為八月二十八日。請把作品電郵至 poemincity@yahoo.com.hk 或郵寄至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《明報月刊》編輯部《明藝》編輯收。

【書訊】

《寫托邦與消失咒》



潘國靈 著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2016年7月

潘國靈首部長篇小說，以其獨特形式，思考寫作世界和消失的種種可能與命運。

小說穿梭於雙重世界間，沙城與寫托邦，此處與他方。以沙城的示範屋苑「華麗安居」為序，進入寫托邦的世界。一個作家驚地消失，女子悠悠追逐其作家情人遊幽於密室中，密室成了一座「招魂屋」。悠悠在寫，恍如尋覓也是與影子共舞，亦像把消失的對象埋葬，將之轉化為幽靈。消失的地方不在沙城現場，而把悠悠引至「寫托邦」國度——心靈鏡像投射或處於沙城內核縫隙的隱蔽處。在寫托邦，悠悠遇上看守人／文字巫師余心，在其召喚下一支流放的寫作族群展現眼前，「夜寫者」、「孤讀者」、「築居師」、「回頭者」、「失焦者」、「巫寫會」、「沉降者」等逐一登場，其中的空間幻景——「寫作療養院」、「回頭橋」、「刻寫板屋」、「消失角色收容所」、「修道院迴廊」等不斷變換。消失的遊幽也許在其中，又或者，他不過是她寫作時捲吐的香煙。

一場城市浩劫，一場文學災難，沙城與寫托邦同時受著「消失咒」所附。華南師範大學凌教授表示：本書乍看像言情、偵探、魔法小說，實際卻不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通俗小說，進入它，就像跌入了無法測底的思想深淵，難解的困境、人生的兩難、深刻的問題，像錐子一般刺痛着，逼迫人思考不已。這痛並快樂着的書，昇華出哲學的韻味。

另《寫托邦與消失咒》設有新書讀演會，由水煮魚文化製作籌劃，與浪人劇場合作。其中浪人劇場藝術總監譚孔文指導劇場新晉演員，代入小說角色，以讀演方式演繹其中幾個小說片段，並由潘國靈親身擔任「說書人」角色。一場文學與劇場的交匯，將於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於水煮魚工作室（九龍新蒲崗八達街三五五號安達工業大廈四樓B室）約定上演，歡迎大眾參與。

支持機構：

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【人物專題】

省思人物 虛實共治——專訪何福仁

——●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

編按：何福仁是香港詩人、作家、評論人。尤專注新詩與散文創作。曾任文學雜誌《素葉文學》、《大拇指周報》及《羅盤詩刊》編輯、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審，亦為教育工作者。近年更投入歷史文獻研究範疇。對這位多元發展、寫作與教學經驗豐富的作家，本版特約記者邀請他做了一次專訪。

問：您的散文不乏幽默，既善諷刺，亦懂自嘲，請您談談中國文學裏的幽默面。

何福仁（以下簡稱「何」）：中國文人有一缺點，喜歡冷嘲熱諷，而鮮有自嘲。西方不同，讀蘭姆、William Hazlitt、Leigh Hunt的隨筆，充滿自嘲的精神。五四作家喜歡痛罵國人，千瘡百孔，自己卻好像獨善其身似的，奇怪。文學藝術就是要批評，包括批評自己。林語堂的幽默小品寫得不錯，像極西方的「familiar essay」，比他的小說好，但並非最好，梁實秋、錢鍾書才是最上乘。錢鍾書、梁實秋更能融合中西文白。幾本《雅舍小品》二字或三字一題，幾乎把天下間的題目寫盡了。雖然梁實秋西學淵博，翻譯莎士比亞全集，煌煌巨作，教人佩服，但不是沒有缺點的，最大的問題，是把原作的無韻詩「blank verse」譯成散文體。這方面卞之琳就好得多。不過詩人譯詩也有高下，戴望舒譯《麥克白》就不如卞之琳。錢鍾書較梁實秋尖刻，若果沒有分寸，便流於刻薄，顯得實弄，但他是極有分寸的。錢鍾書夫人楊絳也是了不起的散文家，《我們仨》我以為是近二十年來，中國最傑出的散文，令我們明白，原來散文可以一面寫實，一面虛構。楊絳不必借重錢鍾書，反而我們可稱錢鍾書為「楊絳先生」。

問：您對魯迅、周作人的散文和雜文又有何看法呢？

何：周氏兄弟誠為五四散文兩大家，缺一不可。魯迅的雜文針對現實，而現實是會隨着時間而改變的，現在重讀，已覺失色了。但他絕對是大師。小說創作方面，沒有人勝過他，你只能寫得不同。魯迅說過，他的雜文應該隨時代而湮滅，反而他的弟弟周作人真做到了這一點。五四初期，周作人曾寫過大約五百篇雜文，與陳西滢、段祺瑞政府罵戰，筆調辛辣，比魯迅刻毒得多。例如《現代評論》收受段祺瑞政府一千元資助一事，就給周作人反覆痛罵，隔了一些日子，又再鞭笞，纏綿不休。這些文章，他再沒有收集。一九二五年，周作人忽然閉口不談時事了，他只留下寫小品文的形象。早幾年，鍾叔河、陳子善等人把這批雜文發掘出來，我們才得以看見。抗戰時，周作人受蔣夢麟囑託，留守北平，當了汪偽政府的教育總督督辦，默默耕耘，擊退諸方覬覦。抗戰勝利，他坐過三年的牢，得到應有的懲罰，後來，翻譯日本和希臘文學，貢獻不小。就這一點，和胡蘭成不同，胡蘭成不會坐過牢，從未認錯。

問：《上帝的角度》中，您展示了對基督教文學、藝術、神學的精湛評論，請談談您對基督教的看法吧。

何：談不上精湛。不過多年來，《聖經》我大概都讀過了，包括偽經，我讀《聖經》如閱小說，我把無法苟同的東西，例如神蹟等等，懸置起來，這叫「suspension of disbelief」。無可否認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遺產，相信與否是另一回事，其實對其他宗教也是這樣。只有當宗教家和霸權勾結，互相利用，才變得可怕。宗教家並不同等宗教，因為良莠不齊。《新約》四部福音，互相參照，但各有敘述的角度，同中有異。要弄清楚，它們各有一個敘事者，那是敘事者的觀點。把《舊約》當寓言來讀，擺脫那些經不起科學考驗的神蹟，不就好了麼？新舊對比，我到底覺得《新約》比《舊約》有趣，比較完整；而《舊約》對女性是否太過歧視？而上帝既造就了「善」，又埋伏下「惡」。

問：您有幾篇散文，寫歐遊時，參觀歐洲教堂名畫、雕塑的心得，資料考證功夫做得很仔細，能談談這類散文的技法嗎？

何：這些大概屬於文化遊記吧，鮮寫風景，但並不代表我不欣賞景色。對我來說，風景難以追摹，就算攝影，經過菲林，或者數碼過濾，始終與眼睛所見的現實有距離，更何況文字，一千字的描寫段落，遠不如鏡頭一秒的畫面。那麼我倒不如去寫一些鏡頭難以捕捉的事物，例如心靈，這也是上世紀當攝影發明後，文學趨向心理描寫的原因，繪畫也從具象走向抽象。但後來，我們又發現完全缺乏故事是行不通的，於是又回到情節的經營上來。所以，作家最好能兼擅各技，敘事的能力還是很重要的。散文無所謂技法，因應內容，把文字寫好，旅遊前，我自己定必做好資料

蒐集，去到當地，再加以印證、對比，開放感性的經驗。

問：化雨春風數十年，新著《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》數篇戲謔教員室的散文，既談諧滑溜，又充滿關懷，但不太見您有以學生為題材的文章，教師似乎正是您關注之所在，對嗎？

何：下筆寫作，我抗拒擺出一副青年導師的臉孔，甚至對這類型的作家也沒有好感。我的上一輩，胡菊人先生即是青年導師，言教身教，正氣凜然，大家都敬重。然而，如今像胡先生、小思老師那樣的人甚少。教育水平提高，分工愈細，社會愈分化，當青年導師談論自己專業以外的事情時，不會比常人優勝，如果仍是一臉導師，就會暴露自己的無知。我想，文人從政，十居其九，失敗收場，強如孔丘、王安石，亦難有作為。論教育，我的確鮮少以個別學生為題，這方面我是刻意避免的，他們不是我的工具。有些學生因為知道我寫詩，寫些什麼，受了些影響，也寫作起來，這很好，這就夠了。他們是獨立的生命，每個都不同。要談教育的話，不如審視香港教育政策的大方向，我認為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教育政策，變來變去，不斷自我否定，卻從不認錯。每次都有政客出來教導我們：教育應該如何如何，要怎樣改，有問題，就責難教師，上肥下瘦，殊不知他們就是問題所在。

問：最近您寫了一篇關於李斯的長文，聽說還計劃出版一本李斯的研究專著，能透露一點研究心得嗎？

何：李斯一生作品不多，他名下的只有七篇，還有一篇他大概不認帳，那就是讓秦二世接位的「矯詔」。雖然不多，但幾乎每一篇均影響歷史的走向。李斯可以選擇當「天使」，亦可以選擇做「魔鬼」，而他揀選了後者。先秦的讀書人，是可以向皇帝說不，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的。那不但不是李斯的個人問題，更反映出整個中國讀書人的責任問題，他們怎樣界定自己。我必須把他放回秦前秦後的歷史、文化氛圍去，這包括先秦的各家學說，尤其是法家，我覺得法家學說本身就充滿矛盾。我盡量讀了我必須讀的東西，包括地上的文獻，以及從地下出土的竹簡。我寫了十三萬字，是一篇長文，分了章節。

我從問自己一個問題開始：我願意生活在秦朝嗎？我希望說秦朝偉大的人，也這樣問問自己。這是一種同理心。如果你不願意，為什麼其他人，包括秦人，就可以了？近來，頗有些人為李斯及秦始皇翻案，其中有西方與日本的學者，例如認為「求仙」等說法，皆是漢代捏造，包括司馬遷，為了鞏固漢朝政權的合法性。其實，有關李斯的說法，大多可疑，也大有爭議。例如他當丞相日子很短，始皇時充其量是左丞相，排行第三，秦始皇也不大信任他。因為「丞相李斯」這銜頭，於是以為秦的各種建設都是李斯之功，例如「書同文」，此說乃由距他三百年的許慎所言；又如秦石刻出自李斯手筆之說，更出自距他七百年的劉勰說的，都史無實據。魯迅的《漢文學史綱要》說：「秦之文章，李斯一人而已」，這說法也是有問題的。他舉《諫逐客書》為例，這文其實寫於秦統一之前，秦統一前的《詩經》、《秦風》，其中《黃鳥》、《蒹葭》等，均是極優秀的篇章。荒謬的是，要談毀文學和歷史的人，正是李斯一人。我也不認為《諫逐客書》是好文章。我嘗試仔細地分析。

問：貓是您喜歡的寵物，散文中常會跳出貓兒的身影，為什麼會這麼喜歡貓的呢？

何：我也養過狗，但愛貓多於狗。養狗較為麻煩，早晚均需要帶牠外出散步，其實這亦不太健康，限制了狗的排泄時間、活動空間。從前住大埔，騎單車出市區，狗兒尾隨，一到鄰村，鄰村群狗便會圍攻之。按我觀察，狗有「眾暴寡」的特性，看見哪一邊得勢，就投向哪一邊，不顧狗友情份，經常打至遍體鱗傷，一個又一個的牙肉。貓也會打架，但那是雙方的事，不會有第三方參戰。如果養一隻動物，不當牠是寵物，而是朋友，那麼貓比狗好得多。貓似道家，高傲獨立，不會整天黏着你，熱情得令你吃不消。有人說狗像儒家，我覺得更像法家，以暴凌弱，愚忠，主人打牠，也搖尾乞憐。對不起，這是人的角度，不是狗的角度。但我反對吃狗，又不是沒得吃的時候，吃狗成節，尤其可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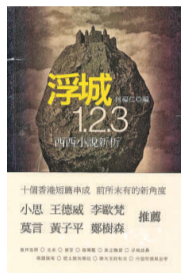
（訪問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。）



▲何福仁近照。【受訪者提供】

何福仁簡介

原籍廣東中山，在香港出生、成長，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。著有詩集《龍的訪問》、《飛行的禱告》，散文集《再生樹》、《上帝的角度》，遊記及讀書隨筆《書面旅遊》等。另編有《浮城 1.2.3——西西小說新析》（右圖）、《西西卷》（香港文叢）。其中《如果落下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》獲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、《時間的話題——對話集》（與西西合著）獲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。



文學創作的寫和讀

●何福仁

幾年前的一個夏天，在報上看到一位語文講師，指責中國語文教本上的語體範文，罪狀是過分歐化，例子是「放着」、「蹲着」，認為這是英文現在進行式的語法，中文不會這樣用的，云云。記得語言大師趙元任譯《阿麗思漫遊奇境記》第七章描述一隻「睡着的」鼠兒，為了表達這鼠甚懶，趙氏譯：「（牠）坐在他們當間，睡得着着的。」着字不單當下進行，更成為俏皮的形容詞。其實，我們翻翻《紅樓夢》之類，譬如說第五回吧，不是通篇「掛着」、「寫着」、「懸着」嗎？再早一些，譬如楊萬里的詩，就有「逢着詩人沈竹齋，丁寧有口不須開；被渠譜入《旁觀錄》，四馬如何挽得回」（題沈子壽《旁觀錄》）之句，這是宋人的口語，既有現在進行式，又有被動式。可見如果要講語法的話，這種用法吾國古已有之，不是洋文獨有。

楊萬里看來很喜歡「逢着」，另有「逢着王人訴不堪」句（「王人」即天子使臣）；照錢鍾書的說法，他的口語都有出典，「他肯肯挑牌子老，來頭大的口語。」且不說這是語文講師不認牌子、來頭，妄下議論的毛病；即使過去所無，為什麼今天就不可有呢？想深一層，以泛語法家的角度看文學作品，字字句句求合於語法，一切繩之於語法，又是否有問題呢？

這毋寧是一般語文老師講授文學創作的問題。我們要求學生把文字寫好，寫得純淨，而且，合乎語法。說來好像不錯，但文學的創作絕非僅此而已，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，那是一種審美的形式，要看效果，那牽涉情感、氛圍、腔調、節奏、表述的角度、角色的扮演等等，不是把冗語刪掉，把長句削短，把被動改成主動，那麼一回事而已。「回也非助我者也」是文學，「回非助我者」卻不是；妙在兩個「也」字，特別是第一個，老先生沈吟、觀瞻的情態乃得以活靈活現。「我被他出賣了」一句，倘一定要改成「他出賣了我」，不能用被動式云云，豈知兩句主客的比重並不相同，意義有別。我們的語文老師挑燈改卷，往往就疲於搜捕這裏多出一個前置詞，那裏額外的一個虛字，見林而不見樹，到頭來什麼都不見。我們忘了每個成功的詩人作家，都有個性：他而且必須有自己獨特的腔調、用語，甚至他自己的套文法；此外，還有他的社會背景、語言環境。翻開辭典，某些措詞用語之所以「合法」，不是由於詩人作家用過嗎？我只怕老師拿起學生的創作，只着眼句子是否通順，是否合乎語法，而看不到他的創意，先要他就範、淨化，文字上的，以至思想上的淨化。響應清理污水，卻連盆裏的嬰孩也一併扔掉。

創作之難，難在創新。文字的粗糙，仍強似思想的平庸。我覺得文字是否簡練，是否合乎語文習慣，其實並不是好作品的前提，只要獲得鼓勵，寫下去，不斷練習，大量的閱讀（不一定要讀文學作品，更不要只讀一種文學作品），遲早會解決這些問題，然後養成自己的寫法、看法。因為最重要的是不是文字，而是思維，是抒寫的眼界，是識見，是想像。有時候，我們反而嫌某些作者寫得太老練，油滑有餘，生澀不足。艾略特（T. S. Eliot）過去有「感受分離」（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）

之語，指文字語言愈趨精緻、簡練，感受反而變得愈粗糙，失去那種貼近耳目的天然狀態；語言與感受，變成怨偶，分了家。惡性循環，汲汲泥執於固定的語文習慣、用語、句式，是否同時桎梏了學子表達一己感受的能力呢？

我反對泛文法的角度，並不意味我排斥語法的研究；一如我反對在中學的中國語文科跟學生苦磨什麼明喻隱喻，什麼借代。這裏談的是年輕學子寫作的問題。文法、修辭格的學習是否對寫作有助益？也許，但又未必。更大的問題是，我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，成為負資產。因為我們的做法是：把有生命的語文弄成死翹翹的東西。

放手讓我們的學生自由地寫，愉快地寫吧，也讓老師愉快地改（這方面，當然還需要其他的配套，如縮減每班人數，等等），彼此從文法、修辭的束縛走出來。與其着眼于文句，不如把心力放在構思上面，深化學生的思維，開拓學生的眼界。談技巧，不如從整體的結構去看，文章哪裏要濃墨重彩，哪裏輕輕帶過就行了。

其次，如果香港的中國文學的教育真要從文學知識的研習轉向創作，除了要擺脫泛文法家的糾纏，還要擺脫的是泛道德家的角度。從各種開放了的中國語文教科書看，所選的大多是被認為適合的教材：一、合乎語文習慣；二、內容健康。變換學生的角度，一個是寫的問題，另一個，則是讀。不談創作則已，要談創作，就得擺脫「內容健康」，泛道德家的標準。我們既要年輕人寫得標準，在創作上，又要求他「健康」地思想，不要逾越道德的界線，不要犯險。這是不相信年輕人有辨別的能力，不相信社會有自我調節的功能。高中的學生，有十七八歲了，是小成年，他們要對自己負責，也應該讓他們負責。可是要他們負責之前，先要讓他們明白社會的複雜性，而不是把他們保護起來。這種想法，實則也是自己長期受保護的結果。這彷彿是一個戴口罩、戴眼罩的社會，為了免疫，我們於是也失去了免疫力。事實上，社會愈來愈多元化，也愈來愈分歧，眾聲復調，年輕人在網絡裏遊走，如果這是個文明的社會，則自會有調節、互補的能力，要疏通，而不是堵塞。有時我想，文學老師同時要肩負道德教化的任務，也未免太苦。

何況，文學藝術，尤其是好的文學藝術，往往是非道德（amoral）的。不是不道德，也不是反道德，而是超乎一時一地的道德規範。文學無禁區，文學家既可以表現美善、理想的世界；也可以表現扭曲的人性，以至邪惡的世界。道德家教人「存天理，去人欲」，文學的世界裏，「人欲」不單不能去，而且要表現它，把它挖出來。我們向青少年講創作，最有效、最實際的途徑，就是要他們多寫多讀，兩者相輔相成，互相闡發。但讀什麼呢？如果只是內容健康、意識良好的作品——某時某地的所謂健康、良好，可能是偏頗、狹隘的。換言之，我們對文學之為文學的看法，本身可能也是偏頗、狹隘的。只讀一類書，只容一種思想，怎能打開眼界？

（此文節選自《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》。）

《明藝》前期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www.mingpaomonthly.com/cfm/main.cfm 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ingpao.com>搜尋>輸入「明藝」